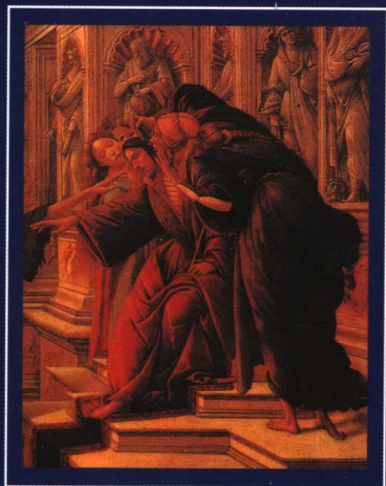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Mark Lilla

[美] 马克·里拉 著

邓晓菁 王笑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Mark Lilla

[美] 马克·里拉 著

邓晓菁 王笑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马克·里拉 Mark Lilla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著有《G.B. 维科：一个反现代者的形成》（1993），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994），《伯林的遗产》（2001）。

译者简介

邓晓菁，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硕士，现旅居德国。

王笑红，北京科技大学工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现为上海三联书店编辑。译有《西方法律思想简史》、《言词而已》等。

致中国读者的短札

知道这本小书要出中文版,我非常愉快。乍看,本书与当代亚洲知识界关心的事距离遥远。它是针对 20 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政治参与而展开的一项既富哲学意蕴,又不乏传记旨趣的调查。然而,我还是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很快地看到蕴含于其中的双重旨趣。首先,因为本书所论及的思想家,从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到米歇尔·福柯与雅克·德里达,都已经对中国近些年来的思想纷争产生了影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我不是很了解中国读者在多大程度上知晓这些人物在纳粹时期和更为晚近的冷战期间的政治参与。本书对那些实践予以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弃置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书。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对政治怀着思想层面上的深刻兴趣,只有试图考虑到他们会怎样设想自己的观念被付诸实施后所产生的深远意涵,我们才能真正充分地理解他们的著作。

从更为宽泛的层面来看,《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意欲

调查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哲学与政治权力——尤其是为暴政所滥用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关系。在西方传统中,有关这一关系的论争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它在今天依旧如当日一样适时。然而,柏拉图的分析不仅限于西方的政治经验,它指向的是一系列普遍的思想与政治问题。暴政对政治生活的挑战经久不衰,从新生的21世纪的经验来看,它也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僭主及其思想上的支持者的面孔、衣着和语言可能变化,位于僭主政治核心地带的基本抱负却似乎植根于人类灵魂深处。本书的写作基于以下假设:我们对那一抱负及助燃它的种种激情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

马克·里拉

2005年10月于纽约城

序 言

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倒要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

——卢梭

生命万象,终归于某个中心。

——艾米莉·狄金森

1953年,当时在西方还藉藉无名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探讨战后波兰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顺从于斯大林主义的所谓正统辩证唯物论以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该书正逢冷战登峰造极之时问世,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然而《被禁锢的头脑》绝非仅是一本冷战的宣传册。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一部令人震撼与不安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米沃什选择细述一些平常的案例而不是极端的事件。那些人身受到胁迫甚或锒铛入狱的作家们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围追堵截他们的人民委员和官吏们也没有露面。相反,米沃什截取的是四位颇为成功的作家肖像,细致入微地刻画他们在战前波兰的智识与政治历程(通常是处于民族主义和反犹太右翼),他们的战争体验(往往是英勇的),以及他们对于苏联所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调适。在每个个案中米沃什都专

注于作家性格里的某一侧面,这一侧面早在生活的前期便显露端倪,之后更逐渐型塑作家的写作以及政治事业的变迁。我们遇到了阿尔法——“道德学家”;贝塔——虚无主义者,其“虚无源于一种伦理激情,源于对世界绝望的爱”;伽玛——“历史的奴隶”;最后还有诗人德尔塔——“一个游吟诗人”。这些肖像可被当作有关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的文献来阅读,但使之更为刻骨铭心的,当是他们对于人类心理学的深刻洞见。米沃什并未道德化历史的进程,他也没有以历史进程的全知全能者自居(战后,他同样也曾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救国之路,并为波兰政府工作,直至1951年他向西方申请政治庇护之前,他一直身为派驻华盛顿及巴黎的文化参赞)。他旨在通过例证展示当某种人格、某类思维模式被卷入政治旋风中所发生的一切。

2

米沃什笔下的肖像是饱含羞辱的。但他们同时又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捉弄着生活在“铁幕”背后的思想家与作家们,有些人不为所动,倾尽全力抵抗着僭主的威逼利诱,另一些人则不免同流合污。许多人如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抉择,自然很难评判他们的功过。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如下事实,即与僭主政治的同流合污同时也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未处于危险境地而完全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是什么诱使他们在为现代暴政提供合法性辩护,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否认暴政和西方自由社会的本质区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们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

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球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这些事实几乎不容争议,对于任何阅读报纸且具有一定道德感的人来说都如此明确。然而,在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成为《被禁锢的头脑》可能的姊妹篇。本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论说,因为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只有通过研习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知识生活和政治生活,才能被最好地领悟。上个世纪有过大量的文字,探究“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无意义的语词,探究一个学者的思想是否可以与其思想的政治用意割裂开来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似乎一直是一个被误问的问题(*une question mal posée*)。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肯定为“是”,欧几里得定理的正确与否与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但是,成年人都明白,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的论题从事的写作并不是在做几何学的室内游戏;他们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政治行为,是这一探求所留下的踪迹。如果我们也处在与他们一样的思想之旅,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对他们的言行以及为什么如此言行进行反思。

诸多 20 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可以被拿来作为哲学—政治考察的课题。我的选择聚焦于这样一类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希望读者在掩卷之时能够确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并未随着 1989 年的到来而烟消云散。另一个动因在于,这些哲人的众多崇拜者仍旧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不计后果视而不见,或者继续为之辩护。我所选择的思想家们,他们来自莱茵河两岸,亦来自意识形态的左右翼,我想以此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一种政治倾向。为从这些肖像中获取教训,我们将在结语中予以分析,希望读者在浏览这个画廊之后能够斟酌、思量。

4

再就书中涉及的这些思想家说最后一段话。在本书中,我无意为读者提供借口,以有失体统为借口摒弃这些思想家。恰恰相反:笔者本人也一直为他们所吸引,而且多年以来从他们的作品中受益良多。然而,我愈是沉浸其中,我的失望感就愈是强烈。我发觉这种失望可以透过卡尔·雅斯贝尔斯写的简短札记——谈的是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其他几位在 1933 年暴政来临之际欢欣鼓舞的德国思想家——获得最妥帖的表达。他的感悟即我的心声:

无论我距离他们有多么遥远,我仍能感到自己对这些人的倾慕——各式各样的倾慕之情,因为他们本身是如此丰富多彩。但这种倾慕永远也不可能发展为爱。我多么想恳求他们将其高深的思想奉献给更善好的权力。惟有当精神中的主宰

力量本身具有尊贵的气质时，精神的伟大方能成为爱的对象。

马克·里拉

目 录

致中国读者的短札

序言

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1

阿伦特引用瓦恩哈根的警句：

“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相”，

这是她最终对海德格尔的看法

雅斯贝尔斯则写道：“如果我们之间曾共有过可堪称为
哲学冲动的东西，

那么，请对你自己的天赋负责！……勿为邪恶的魔法
为虎作伥。”

但海德格尔，至死，都不道歉

第二章 卡尔·施米特 43

他曾被称作纳粹的“桂冠法学家”

他直到临终，也没有对与纳粹合作表示过丝毫后悔
但雷蒙·阿隆在回忆录中称：施米特是马克斯·韦伯

那一传统下的伟大的社会哲学家

而且，他竟成为战后欧洲左翼的思想源头之一

第三章 瓦尔特·本雅明 71

人们给本雅明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只知他为迷
离纳粹, 草草服毒身亡
但通过肖勒姆和阿多诺的眼睛读他的思想, 能看到他
如何陷入渴望弥赛亚和暴力的空想
然而, 他还在空想, 世界已群魔乱舞

第四章 亚历山大·科耶夫 109

他是“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
他的学说因冷战结束而尽人皆知
但列奥·施特劳斯却看出他立场的危险性
他期待着指日可待的弥赛亚, 不惜以自己的
哲学与暴政的合作去实现它

2

第五章 米歇尔·福柯 133

他曾热烈地讨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也曾走上1968年5月的巴黎街头
但他的种种努力, 都是以尼采的范式与自己心魔的斗争
他对政治并没有真正的兴趣, 也不承担真正的责任, 他
对政治的介入既危险又荒谬
欲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公共政治世界, 需要的是一种全
然不同的自我“规训”

第六章 雅克·德里达 153

他是后结构主义的英雄
他在冷战结束后才倒向政治
但他提不出任何政治目标, 尽管他坦言, 每次听到《国际歌》

总难抑激情
他终于发现了一个不能被解构的东西：“正义”
但他所期望的“民主”，却永远只在“将至”的状态

后记：叙拉古的诱惑 185

柏拉图三赴叙拉古的寓言
成为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宿命
为解释这个宿命，可以找到很多种叙事
但它们都只是局部甚至错误……

译后小记 209

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



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尽管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惟一真挚的爱者，惟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里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Symposium) 209b 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

柏拉图说，因为爱欲不总是导向哲学，所以必须极谨慎地对待它。如果爱欲萌生在一个无节制的人的身上，灵魂就会陷入感官的愉悦、对金钱的爱、醉态以至癫狂。爱欲的力量极为强大，它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和自然本能，将它们引向自己的目的并成为灵魂的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发问，如果暴政不是一个人被自己最低下的欲望主宰，对人民进行不公正的统治，那么它又是什么？根据

柏拉图的界定,爱欲是漂浮于人与神之间的魔力,帮助我们上升,或者将我们的灵魂输送到卑微而痛苦的生活中,并连累他人一起经受磨难。哲学家与僭主,最高尚与最低等的人类,就是通过爱的力量中某种乖戾的伎俩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已不再习惯于这样来思考爱欲了。在我们看来,情欲吸引、思想活动、政治世界都是独立运转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受不同的规则支配。因此,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界中最非同寻常的故事,亦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爱与友谊。这三位思想家初识于1920年代,不久后即因为对哲学共同的激情而同气相求。但随着他们卷入震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剧变中去,对哲学的激情就流溢到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年轻时的情侣关系已为世人所周知,但这并没有太多的发人深省之处。真正重要且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恋爱最早是由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 - Bruehl)在其引人入胜的传记《汉娜·阿伦特:为了世界的爱》(*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1984)中予以披露的,因为扬-布鲁尔女士下笔谨慎斟酌,所以她的描述在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然而,数年前,随着埃尔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的研究《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Hannah Arendt/ Martin Heidegger*, 1995)的出版,这段爱情成了令人反感的话